

業、婦女解放)的影響,從而影響她們對醫學權威的接受程度。如果作者能在這方面加以落墨,將更能說服讀者為何19、20世紀時期的美國,會把科學奉為「完美母親角色」的必要條件。

盧淑櫻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438頁。**

《曾國青銅器研究》是一本16開近400頁的大書。其題目就讓人不可抗拒。自曾侯乙墓發掘以來,人們都知道湖北隨棗走廊在周代存在過一個鑄造出精美編鐘和許多其他青銅器的曾國。但在文獻中,卻沒有關於這個曾國的任何記載。在隨棗走廊,通過文獻只能看到春秋時期有一個頗具實力的「隨」國,可是這個隨國的青銅器,迄今為止卻一件都沒有被發現。曾國是否真實存在?曾國與隨國是何關係?曾國的問題已經成為周代歷史最大的疑團之一。曾國之謎,可以說由青銅器而生,自然也應該由青銅器而解。在此之前學界一直沒有專門研究曾國青銅器的專著,這一問題不弄清楚,幾乎影響江漢地區兩周時期所有歷史問題的解決。《曾國青銅器研究》專攻曾國銅器,作者張昌平研究員又是湖北當地的考古學者,這項研究,對於曾國之謎的解答,意義自不待言。

物質文化的生產過程,已經成為目前考古學器物研究關注的一個新方向,《曾國青銅器研究》內容上最大的亮點就是對鑄造痕跡和鑄造技術的全面的和有系統的研究。鑄造技術理應受到重視,因為它與「風格」存在密切的聯繫。「風格」是青銅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研究者用「風格」來描述器物在某一時代器型、紋飾方面的整體特點,也借助「風格」來判定一件銅器的大致年代。雖然研究者往往直接宣稱時間的變化會造成器物風格的變化,但這種論斷其實存在一個致命的邏輯缺點:青銅器不是草木,不會自然就長高變大,時間究竟如何影響器物形態的變化?這被遺漏的環節就是「技術」。只有人的技術變化了,器壁厚薄、耳足形狀、花紋複雜程度才會相應變化,器物「風格」也才會呈現出變化。

過去由於對鑄造環節關注不夠,銅器「風格」研究時常呈現為某種藝術史式的描述。《曾》書未循舊例,直接抓住鑄造技術做文章,來解釋銅器風格的變化。在此書出版以前,材料圖集《曾國青銅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文物出版社，2007年）已經出版，配合《曾侯乙墓》報告（湖北省博物館，文物出版社，1989年），可以很直觀的看出兩周曾國銅器的風格變化。總體上，曾國銅器風格是由簡潔到繁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裝飾附件從無到有、再到大量使用的變化過程。作者指出，兩周之際以後，出於簡化技術難度的需要，分鑄焊接技術（榫氏焊接）發展起來。這種技術下，青銅器的各個構件不再需要像早期那樣與主體同範一次渾鑄成型，而可以先鑄，之後再與器物主體鑄接或焊接。這樣，器物整體的鑄造難度降低了，「鑄造技術的重點由器物主體向附件的轉移。」（頁264）鑄造工人可以投入更多工作量在附件上，附件的品質和造型複雜程度都可以相應提高（頁265）。在這樣的分析下，戰國時期曾國青銅器附件豪華繁麗風格的出現正是順理成章。

除了充滿新意的鑄造研究外，考古學的傳統研究方法當然在書中也隨處可見。而如何將傳統方法用得精彩，是一個不比創新更容易的問題。比如標準器法，選取紋飾器型最有代表性的某件器物作為一個時代的標準器，研究時將器物與標準器進行對比，推定其時代。這是目前青銅器分期斷代最為通用的一種方法，看似簡單，在使用中卻很容易出現瑕疵。因為這種方法存在兩個隱含的問題，一個是兩地的空間距離是否會造成器物特徵出現時間上的差異，一個是不同地點起源的要素在形式上是否會偶合。目前研究中很少有學者願意明確談這兩點問題，也一般不做專門的處理，但這兩點往往會引起研究結論的偏差。引用《曾》書提到的一個例子：湖北出土的曾伯隨與河南安陽婦好墓出土商代中晚期卷雲式鏞、陝西寶雞茹家莊M1乙室出土西周早期方盞弧刃斧等器物之間在時間上存在較大的缺點，但形制上又比較近似（頁134）。這三件器物在時、空方面的矛盾，集中反映出了標準器法隱含的兩方面問題。如果將其中任何一件設為標準器，對另外兩件進行斷代，都會謬以千里。

《曾》書的章節設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這兩方面問題對結論的干擾。全書主體從第二章開始，首先按照器物可信程度篩選出26個單位，從器形、紋飾、鑄造技術等器物本身的特徵入手進行斷代，其間儘量避免參照其他地區的出土器物。後面第三、四、五章在分期斷代的基礎上，分別將曾國青銅器與周系、楚系和淮漢間黃、蔡兩國銅器進行比較，分析聯繫和差異。這種研究結構，不是通過器物要素的相似性來尋找時間上的關聯，而是將不同地區器物間的差異性作為深化問題的切入點。這樣一來，可謂揚長避短，既避免了標準器法在時空方面的問題，又充分發揮了比較方法的效力。以往研究中也不是沒有類似的問題意識，但這樣思路清晰的研究實踐卻着實不多。

考古學是文科中的理科，行家們多是邏輯高手，其推理方法有不少都值得歷史學借鑒。標準器法的思路對歷史學的區域史研究就可能會有所啓發。標準器法雖然存在缺陷，但卻有一個好處：為不同年代、不同地點出土器物相互比照提供了中介。每件銅器都有自己的特徵，如果沒有標準器，不同時間或空間條件下的器物基本不具可比性，那麼即使出土再多，我們對於青銅器的認識也仍然是零碎的。有了標準器，器物之間就可以借助標準器形成關聯，進而整合在同一個時空框架，我們也就可能對商周青銅器總體面貌形成一些基本認識，再不斷深化。目前的區域史研究，雖然取得很大成就，但卻存在一個隱憂。由於每個個案在區域性質、尺度選擇、問題設計等方面都不統一，研究成果雖多，互相卻很難對接。我們設想，如果在區域研究中引入標準器法的思路，選取一個已有比較成熟的研究的地區作為標準區域，在進行其他區域研究時，性質、尺度、問題上都注意與之參照，那麼是否有可能幫助解決區域研究不斷瑣碎化的問題，並將分散的區域研究成果拼接，發展為一個大尺度、全國性的認識？當然，一個區域的複雜程度要遠遠高於一件銅器，這一設想的可行性，還需要實踐來驗證。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希望，即使是閱讀考古學的著作，也不只獲得材料上的補充，在思路方面也能得到一些啓發。

區域也是考古學的天然維度，《曾》書中就涉及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問題。作者將曾國所在的區域稱為「漢淮」地區，指出這個區域跨大別山東西兩側，包括淮河上游和江漢平原。作者指出了這一區域的客觀存在，並注意分析曾國與這一區域內其他國家如黃、蔡等之間的聯繫。此觀點很有見地，「漢淮」區域在兩周歷史上極為重要，與諸多重大事件都密切相關，確實是一個很有關注價值的地區。

但作者對這一區域歷史進程脈絡的把握似乎有些模糊。在對這個區域的論述中，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比如作者稱：「兩周之際的曾國文化勢力較強，曾國的典型器如附耳寬腹鼎傳播影響到豫東和山東。春秋中期之後，楚文化的強勢對江淮地區青銅文化形成很大的影響，並在這一廣大地區形成文化面貌接近的楚系文化圈。」（頁319）指出漢淮區域內文化要素傳播的方向一直是自西向東的。但在將曾國器與其東鄰的黃國器進行對比時卻發現：「他們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卻並非如想像中那樣強烈。特別是在可塑性較強的器型方面，兩國青銅器的相似之處也不太多見。」也就是說，曾國的影響可以遠達山東，卻無法影響周邊。這個矛盾，作者沒有給出明確的解釋。於是作者一方面將漢淮劃為一個區域，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這個地區內部其實

「並未形成壓倒性的文化共性。」（頁304）

問題可能出在材料的性質上。區域的形成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一點向外傳播形成區域，一種是多點之間互相聯繫融成區域。形成區域要經歷一些發展階段，不同階段不同地點的實力對比不同，文化傳播的方向也會不同。單純依靠考古材料，只能判斷哪些點之間存在聯繫，卻很難判定究竟是誰影響誰。器物要素分析如果不結合文獻，結果往往是研究者對哪一部分材料關注度高，就形成哪一點向其他點傳播的印象，而忽略了點之間傳播方向可能的變化。

曾、黃銅器實際狀態與作者對漢淮區域發展脈絡的分析無法咬合，恐怕就是因為這個問題。顧頡剛曾對西周淮夷相關文獻進行過梳理，對周代淮河流域的開發進程提出過一個基本認識，認為周公成王東征以後，山東半島的夷人在王朝軍事打擊下南遷，進入淮河流域，並沿淮西前進，一直達到淮河上游，控制了整個淮河流域。（顧頡剛，〈徐和淮夷的遷留〉，《文史》（中華書局），1990年，第32輯。）也就是說，漢淮地區的文化交流，可能首先是夷人遷移造成的自東向西的傳播。直到春秋中期楚國強大以後，伴隨着楚國的軍事擴張，漢淮之間的文化傳播才轉而主要自西向東。

據文獻記載，黃國為嬴姓，為少昊後裔，正屬於淮夷人群建立的國家。黃國青銅器之所以與曾國青銅器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正是因為黃國在文化上本來就與曾國不屬於同一集團。而作者用來比較的黃國青銅器又都屬於春秋早期，淮夷達到淮河上游不久，江漢文化也還未大規模向東擴張，曾、黃兩國的銅器都保持各自的風格，正反映出當時漢淮地區的真實情況。如果依《曾》書作者對文化傳播方向的推斷，曾國作為文化強勢一方比較早的就可以影響東方，那麼緊鄰的黃國恐怕很難成為漏網之魚。這一點，很容易從楚強大以後曾、黃所在地區很快都被楚文化所同化的事實得到印證。

如何處理文獻材料與發掘材料之間的關係，似乎是歷史學與考古學對話中永恆的話題。作者出於對「編史（Historiography）傾向」的警惕（頁13），對文獻使用是很慎重的。但曾國謎團閃閃發光在待人破解，將器物研究與文獻脈絡比照勾勒出一部封國史，總還是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所以，雖然作者指出「曾國青銅器的研究目的是通過考古學研究的手段，建立曾國歷史文化框架。曾國與歷史文獻中哪一個國家相對應，甚至可以說不是建立這個框架中必要的一個項目。」（頁21）但還是在第六章和附錄中，對曾國的歷史脈絡和相關問題進行了一番辨析。

《曾》書對曾國歷史框架的基本認識是：早期曾國青銅器代表的是姒姓

曾國，晚期代表的是姬姓隨國。姒姓曾國至遲在殷墟第二期文化時期即已立國，商時期大約活動於今隨棗走廊一代，西周早期與周人關係密切，西周末年，參與了申國的叛亂。春秋早期，隨國滅曾國（頁372、389）。但這樣的推論，也會有一些問題很難解釋：姒姓曾國爲什麼在西周末年的王位爭奪中不支持與自己同姓的褒姒，卻去聯合異姓的申國？在「神不馨非類、民不祀非族」的先秦時代，取曾而代之的隨國怎麼會在祭祀祖先的器物上更改自己的國名？究竟是隨國替代曾國，還是曾國替代了隨國？

任何歷史事件都是發生在具體空間之內的，隨棗走廊區域範圍就這麼大，這兩個國家如果不能同時共存，那就只能前後接續。以往對曾國的研究，往往認爲曾隨之間非此即彼，所以在時空分析上都漏洞百出。儘管具體的結論可能還需要探討，但《曾》書指出，春秋早期的曾國青銅器不少都被刮削過銘文，同時還存在墓葬被毀、器物流散的情況，爲隨棗走廊春秋早期的政局變動提供了的重要證據，對進一步明朗問題解決的方向有重要意義。

孫華在序中稱讚，《曾國青銅器研究》是「這些年來對一個周代封國青銅器研究得最深入的著述」，我想這不僅是指書中的器物研究，更是在肯定整個研究展示出的豐富的問題角度和分析層次。《曾》書雖然旨在研究曾國青銅器，卻沒有把問題局限於青銅器，對曾國歷史、漢淮區域文化面貌、整個周王朝政治發展進程等不同性質、不同尺度的問題都有思考和分析。這樣的研究，不僅符合商周考古關注「類型式以後做什麼」的發展方向，對歷史學的先秦封國研究該如何縮小尺度、拓展深度也頗具參考意義。

《曾國青銅器研究》對以前的曾國研究進行了很好的總結，也給未來研究提供了一個新平台。關於曾國的討論還遠沒有結束。隨着新材料的出現和對整個西周封國研究的深入，曾國的歷史真相終究會浮出水面，在此之前，關於曾國的討論會在更大的背景和更深的思考下不斷延續。

于薇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鮑江，《象徵的來歷：葉青村納西族東巴教儀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2，8，4，379頁。**

鮑江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納西族東巴文化與象徵理論的研究。爲了從東巴教本身來解讀東巴教的義理，早在1997年，他就到麗江東巴文化研究所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向研究人員和老東巴學習記錄納西語的國際音標，熟悉東巴